

# 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 40 年 院士忆高考 ⑮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 我们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受益者

■ 邓子新



邓子新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微生物专业学习,1987年获英国东英格兰大学分子生物学博士学位。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武汉大学药学院院长、武汉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国际工业微生物遗传学国际委员会主席。主要从事放线菌遗传学及抗生素生物合成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首次在众多细菌的DNA上发现了硫修饰,这是在DNA骨架上发现的第一种生理性修饰,打开了DNA硫修饰这个全新的科学领域。先后主持50余项国家级和国际合作项目,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300余篇研究论文。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2010年当选美国微生物科学院院士。2012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7年获谈家桢生命科学成就奖。

1978年的那个春天,我挑着一根扁担上了火车。扁担前后悬着沉甸甸的篓子,篓子里是铺盖卷——这就是我将要带到大学的行头。前来送行的父亲和大舅特地陪我坐了一站,从十堰坐到六里坪。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让我们也坐一次火车嘛!”来到武汉,抬头看见天上一架飞机飞过,我意识到从此就要走进一个崭新的世界了。

我考上大学,是十里八乡的大新闻,不光全家男女老少激动万分,邻里乡亲也奔走相告。而就在不久前,我还挣扎在因家庭成分不好而处处碰壁的人生中。这场回归的高考,乃至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对我个人命运的改变是翻天覆地的。

1957年,我出生在湖北房县,一个当时与世隔绝的小乡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我是老么。旧社会时,我的家族以纺织业为生,在当地有一点影响,祖上也出过读书人。但到了父母这一辈,都大字不识一个。我上学的时候,家境十分困苦,连两块学费都交不起。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尽可能地支持我们读书。

我家成分不好,土改时被划成“富裕中农”,“文革”期间被定性成“漏网地主”。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女会有何际遇,哥哥姐姐们已经给我做了“示范”:招工没戏,想当兵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一切理想都没有机会实现。

18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各种脏活重活都挑在肩上,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我心里,一直有个跳出农门的梦想,一直有种改变命运的渴望。

我以前学习成绩不错,也积淀了一些对文学创作的兴趣。于是我自发做起了“土记者”,拿个小本本四处采访,农民的新人新事,农村的精神面貌,都是我的素材,各种过期的报纸杂志就是我的教材。

渐渐地,我写出了一点名气,县、镇上有什干部会议、民兵工作,甚至妇女计划生育典型,都来找我报道。那时候“土记者”投稿不用贴邮票,我就在稿纸下面垫上七八层复写纸,手腕上攥着劲儿写字,写出一式几份的稿子,手南海北地到处邮寄。人民日报社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大概都收到过我的投稿。

终于,《邵阳报》采用了我一篇通讯报道,还把我评选为“优秀记者”。我自豪得不行了,从此更是一发不可收,一件芝麻大的事儿也能写出洋洋几万字。

回想那段白天在生产队上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的日子,难免觉得天真好笑。但当时的我,对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极大希望,希望能被伯乐发现,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机会。

现在想想,我为改变命运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当时大多付之东流,但长远来看,正是这些“胆大包天”的行为让我受益匪浅。所谓功不唐捐,大抵如是。

学生还能得到一点助学金,但还是常常吃不饱饭。班里有些同学周末回家,就把多余的饭菜送给我们。食堂伙食油水少,我这样的小伙子一顿就能吃掉三张饭票。

夏天的武汉是个大火炉,五六个学生挤在一个寝室里,自习时都是满头大汗。热得受不了,我们索性卷起一张席子,跑到楼顶上去享受自然风睡觉。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爱说一句话:“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因此,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大家都创造一切机会去学习。没有课本,就由老师亲自写教材,让写字好看的同学手刻成版,再油印出来。为了省钱,我把买来的墨水都兑上一半清水,导致笔记本上的字迹多数都已褪色。但是直到今天,我翻看这些笔记时,还能依稀记得课上讲过的知识。

当时最困难的是外语学习。在乡下时,我哪里想过要学外语。上大学后才发现原来外语这么重要,而班里那些城市来的同学,好多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为为数不多的农村学生,我入学时是班上英语最后一名。

从那时起,我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床学英语。拿着一本《英语900句》,每个星期将15句背得滚瓜烂熟。完全凭着一股毅力,我的英语成绩后来居上。几年后能出国留学,也得益于自己不错的英语功底。

刚上大学时,我没什么雄心壮志,能离开农村,找到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就是我的理想了。是几位恩师让我看到了更加宽广的世界。

在老家,我算有名的笔杆子,中学老师都劝我学文科。可当高考志愿摆在眼前时,我发现文科院校寥寥无几,理科院校倒是很多。我想着只要考上了就好了,其他还顾得了什么呢?为了增加中榜的机会,我决定选择一所理科学校。

我当时以为天底下只有“数理化”三门学科,所以报的也都是这些专业。至于微生物是什么,我听说都没听说过。

那年,华中农业大学在志愿填报结束后临时增添了微生物专业,因此没有公开对外招生。我们班上的学生好像都是服从分配调剂过来的。开学了我才知道,微生物学可是生命科学的前沿,是当时农大响当当的专业,同学们都感到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跟现在繁华的大学城比起来,那时候的大学条件很差。我们上大学不收学费,家境困难的

我是农村来的学生,按理说毕业后应该回老家。但我们的老院长陈华癸院士,还有微生物学教授周启老师很看重我,他们赴英国考察归来后,力荐我到英国John Innes研究中心攻读学位。

出国学习这样的人生大事,我自己都没怎么操过心,都是老师们为我铺好了路、搭好了桥。我更没想到的是,在英国,我学习的实验室是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中心,我的导师也是世界上很有名望的大师。这些人生中的宝贵机遇,统统都在意料之外。

我这一辈子,遇见了很多恩人、很多贵人,酸甜苦辣都尝过,善善恶恶都见过。一路走来,每一步都是改变命运的博弈。

高考以前,我因家庭出身处处碰壁;高考上榜后,我的人生从此十分顺利。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震撼之感,与我后来在科研上取得重大成果时的喜悦之情,有着同样的分量。

科研是最容易品尝挫折的工作之一。常常一项工作做一年半载,才发现下的功夫都打了水漂。而我早已习惯了在逆境中生存,早已练就了不被困难打倒的意志。在科研中丧气一百次,一千次,最后还是会选择坚持,在失败中逐步走向成功。

40年前,恢复高考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的两大举措,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先河,为个人发展提供了新的舞台和世界,为国家发展提供了优秀的人才和人力资源。而以学识而非出身论高下的公平选才理念,唤醒了整个社会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念。这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是那个时代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那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一大批选拔出来的精英人才在科研领域填补了国内空白,在教育领域缩短了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个人的进步与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发展总是同步的。改革开放改变了千千万万考生的命运,更改变了国家的命运走向。这些年我跑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少世面,越来越笃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历史真理。我设立了邓子新教育基金,支持家境贫困却渴求进步的青年深造,激励青年学子报效祖国,愿为培植创新人才尽些微薄之力。

希望我们的年轻学子,都能树立自强精神,怀抱家国情怀,认识我们国家的历史和发展脉络,把中国梦和个人梦融合起来,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这一代年轻人,是非常关键的一代人,希望大家能站在自己的历史地位上,肩负历史使命,为国争光,为民造福,重新塑造中国的未来。

我常说:“一帆风顺的人不会有大的作为。”今天的年轻人虽然各方面条件比我们好得多,但他们面临的各种竞争非常激烈,也算是一种新的逆境,希望大家不要消沉,用永不放弃的坚持与执着,把中华民族数千年的辉煌在新时代发挥到淋漓尽致,让科学的天空群星闪耀。

(本报记者李晨阳整理)

### 博物古今

看来射干作为一种颇具君子风范的奇花异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与居高望远的意象有着切实的联系……

暑期在山中采样,行至半山时,路边偶然见到几株橙红色的小花,花瓣上还散生着深红色的斑点,再看那宽扁的剑型叶片,一下便认出来是射干。一路向山顶行走,沿路的射干也没有断了行踪,直到山顶一片空旷的茶园时,路边还有不少打着花苞或者盛开的射干。

看到在这高山之巅的射干时,不由得便想起了魏晋诗人阮籍在咏怀组诗中的那句“修竹临幽中,更早些年代的《荀子·劝学》,在“蒙鸠与射干”的故事中也提到射干“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看来射干作为一种颇具君子风范的奇花异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与居高望远的意象有着切实的联系,宋代的梅尧臣、元代的刘基等著名诗人也在他们的诗中提到了这一意象。

射干一名听起来很奇怪,让人一时摸不到头脑甚至读错,这个名字正确的读法是“yè gān”。历史上,射干也有很多别名,与叶子有关的就有“扁竹”“老君扇”“凤凰草”“扇把草”“鱼翅草”“山蒲扇”“剪刀草”等,和花的颜色有关的也有“金蝴蝶”“野萱花”“黄花扁蓄”等名称,射干一名的由来应该与陶弘景所述“茎长,如射人之执竿”有关,射人指的是《周礼》中记载的手持长竿、掌管射仪的官员,古时射,夜常诵读,所以射干读音就变成了“夜竿”,历史上射干也有一个别名叫做“夜干”。

在现代的分类系统中,射干(*Belamcanda chinensis*)属于鸢尾科射干属,其英文名为blackberry lily,应该是由花房中黑色的种子而来。这一分类与我国古人的认识基本相同,但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历史上,鸢尾和射干的关系可谓是颇为错综复杂,《广雅·释草》便说“鸢尾、乌菟,射干也”,陶弘景也谓二者是一种;苏恭、陈藏器则认为紫碧花者是鸢尾,红花者是射干;其间还有提及白花者,但是红花者是射干倒是共识。

射干株型奇特,花色喜庆吉祥,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此外也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神农本草经》中已有明确记载,“主咳逆上气,喉痹咽痛”,但被列为下品,目前仍然有射干利咽口服液,射干抗病毒注射液在市场上应用,也见有少量有关毒副作用的报道。现代的药理学研究也证实一定浓度的射干煎剂或浸剂确有抑制或延缓腺病毒及甲流病毒等感染的作用。

在宋玉的《高唐赋》中,射干则是以香草的身份出现的:“秋兰兮蕙,江离兮青。青荃射干,揭车苞并。”西汉刘向所作的《楚辞·九叹》和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有“掘荃蕙与射干兮,耘藜藿与藿荷”及“揭车衡兰,藜藿射干”之句,这几篇文章中的射干,据古今考证,都是和兰草、江离等著名香料植物齐名的香草。

在西方国家,鸢尾科植物被誉为香料中的昂贵精英,有些香水中便加有鸢尾花提炼出来的精油成分。现在市场上虽然偶有射干精油销售,但是并未听闻有何历史文化渊源可言,射干作为香草和文化使者的身份,已经被我们基本淡忘了。



射干 张叔勇摄

### 高山之巅的射干

张叔勇

### 小山村里的“土记者”

1957年,我出生在湖北房县,一个当时与世隔绝的小乡村。家里兄弟姐妹5个,我是老么。旧社会时,我的家族以纺织业为生,在当地有一点影响,祖上也出过读书人。但到了父母这一辈,都大字不识一个。我上学的时候,家境十分困苦,连两块学费都交不起。尽管如此,父母还是尽可能地支持我们读书。

我家成分不好,土改时被划成“富裕中农”,“文革”期间被定性成“漏网地主”。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女会有何际遇,哥哥姐姐们已经给我做了“示范”:招工没戏,想当兵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一切理想都没有机会实现。

18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各种脏活重活都挑在肩上,是家里的“顶梁柱”。但在我心里,一直有个跳出农门的梦想,一直有种改变命运的渴望。

我以前学习成绩不错,也积淀了一些对文学创作的兴趣。于是我自发做起了“土记者”,拿个小本本四处采访,农民的新人新事,农村的精神面貌,都是我的素材,各种过期的报纸杂志就是我的教材。

渐渐地,我写出了一点名气,县、镇上有什干部会议、民兵工作,甚至妇女计划生育典型,都来找我报道。那时候“土记者”投稿不用贴邮票,我就在稿纸下面垫上七八层复写纸,手腕上攥着劲儿写字,写出一式几份的稿子,手南海北地到处邮寄。人民日报社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啊,大概都收到过我的投稿。

终于,《邵阳报》采用了我一篇通讯报道,还把我评选为“优秀记者”。我自豪得不行了,从此更是一发不可收,一件芝麻大的事儿也能写出洋洋几万字。

回想那段白天在生产队上干活,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的日子,难免觉得天真好笑。但当时的我,对这些“作品”可是寄予了极大希望,希望能被伯乐发现,得到一些好的工作机会。

现在想想,我为改变命运作出的种种努力,在当时大多付之东流,但长远来看,正是这些“胆大包天”的行为让我受益匪浅。所谓功不唐捐,大抵如是。

### 只给我半天的备考时间

村子里信息闭塞,就连恢复高考的消息也很难飞进来。记得有一次,大队书记开完会回来向我们传信儿:“高考虽然改革了,但还要和贫下中农推荐制结合起来。如果两个人同时考上,只能走一个的话,还是要听贫下中农的话,群众推荐谁去,谁才能去。”

后来我才知道,他传达的“精神”跟中央全面恢复高考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恢复高考之前,谁能上大学、谁能上中专,都是贫下中农推荐。到了1977年,大队书记已经把82级的大学生人选都确定了,根本不会有我的份。

不管怎样,后来真正得知恢复高考后,人人都憋着一股劲儿,想通过这次考试改变命运。为了准备考试,我身边的贫下中农子弟都得到了特许,可以两个月不去上工。但每天清晨4点,大队书记还是亲自到我家喊我上工,去搞治山、治水、治农田的“三治建设”。那段时间,我每天的睡眠时间还不足三个小时。

就这样,直到高考前夕,我只得到了半天的报考时间,复习功课几乎无从谈起。身边还总是有声音提醒我,“教育”我,让我不要想入非非,老老实实把活儿干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中的绝望不难想象。但不管希望多么渺茫,我始终没有放弃。

### “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

在老家,我算有名的笔杆子,中学老师都劝我学文科。可当高考志愿摆在眼前时,我发现文科院校寥寥无几,理科院校倒是很多。我想着只要考上了就好了,其他还顾得了什么呢?为了增加中榜的机会,我决定选择一所理科学校。

我当时以为天底下只有“数理化”三门学科,所以报的也都是这些专业。至于微生物是什么,我听说都没听说过。

那年,华中农业大学在志愿填报结束后临时增添了微生物专业,因此没有公开对外招生。我们班上的学生好像都是服从分配调剂过来的。开学了我才知道,微生物学可是生命科学的前沿,是当时农大响当当的专业,同学们都感到非常幸运、非常自豪。

跟现在繁华的大学城比起来,那时候的大学条件很差。我们上大学不收学费,家境困难的

### 意料之外的宝贵机遇

学生还能得到一点助学金,但还是常常吃不饱饭。班里有些同学周末回家,就把多余的饭菜送给我们。食堂伙食油水少,我这样的小伙子一顿就能吃掉三张饭票。

夏天的武汉是个大火炉,五六个学生挤在一个寝室里,自习时都是满头大汗。热得受不了,我们索性卷起一张席子,跑到楼顶上去享受自然风睡觉。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爱说一句话:“把失去的十年夺回来!”因此,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大家都创造一切机会去学习。没有课本,就由老师亲自写教材,让写字好看的同学手刻成版,再油印出来。为了省钱,我把买来的墨水都兑上一半清水,导致笔记本上的字迹多数都已褪色。但是直到今天,我翻看这些笔记时,还能依稀记得课上讲过的知识。

当时最困难的是外语学习。在乡下时,我哪里想过要学外语。上大学后才发现原来外语这么重要,而班里那些城市来的同学,好多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作为为数不多的农村学生,我入学时是班上英语最后一名。

从那时起,我坚持每天早上5点起床学英语。拿着一本《英语900句》,每个星期将15句背得滚瓜烂熟。完全凭着一股毅力,我的英语成绩后来居上。几年后能出国留学,也得益于自己不错的英语功底。

刚上大学时,我没什么雄心壮志,能离开农村,找到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就是我的理想了。是几位恩师让我看到了更加宽广的世界。

在老家,我算有名的笔杆子,中学老师都劝我学文科。可当高考志愿摆在眼前时,我发现文科院校寥寥无几,理科院校倒是很多。我想着只要考上了就好了,其他还顾得了什么呢?为了增加中榜的机会,我决定选择一所理科学校。

### 西洋镜

## 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发布

近日,2019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发布,不少有趣的新纪录被收入其中。

来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救援犬 Feather 就是一只弹跳力超强的狗,它可以跳到191.7厘米,仅次于2016年里约奥运会创下的英国女子运动员跳高纪录少了几厘米。

Feather的主人 Samantha Valle 说,她在看到 Feather 跳起来能碰到地下室的天花板时,就看出了它的天分,并开始对它进行训练。

另一只打破纪录的狗同样出自 Samantha 的调教之下。这是一只名叫 Geronimo 的边境牧羊犬,它能在一分钟完成128下交互跳绳。人类在该项目上的世界纪录是133下,是由来自上海的黄俊凯、姜大礼和金振宇于2017年9月完成的。



这只名叫 Geronimo 的边境牧羊犬能在一分钟内完成128下交互跳绳。

今年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还有两位老人。84岁249天的 Betty Goedhart 是最高龄的“空中飞人”表演者。Betty 从小就相信,只要有决心并付出努力,就可以做成任何事情。这也是她在78岁高龄开始练习“空中飞人”的原因。

另一位打破纪录的老人是来自日本东京的 Sumiko Iwamura。Sumiko 白天是饭店老板和厨师,晚上变身成摇滚 DJ Sumirock,83岁188天的她成为最高龄的俱乐部专业DJ。“做完全不同的事情让人精力充沛。”Sumiko 说。

## 东京奥组委用学分吸引志愿者



通过奖励学分来吸引大学生,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人们对“志愿者”含义的质疑。

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已开始两年了。当时相关机构对志愿者申请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如今他们尴尬地发现,最大的问题其实在于免费劳动力数量不足。

鉴于此,组织部门转而开始从数量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中重点招募志愿者,并表示可以为有意参与志愿服务的学生调整课程安排。

学业不被耽误是个好事,但这一举措也清楚地暴露了东京奥组委的打算,那就是他们并不想给奥运会付出劳动的人们以报酬,尽管这些人必须会说外语、工作须满一整天、需要参加多次培训的高技能人才。

另外,这一举措也引发了人们对“志愿者”含义的质疑。显然,对于东京奥运会需要的11万名志愿者来说,现在的招募人数远远不够。但通过奖励学分来吸引大学生,会在道德上引起争议。一些学生可能会为了拿到学分而不得已去做志愿者,这显然违背了志愿活动的初衷。

“志愿活动本质上是自愿参与,奥运志愿者与救灾志愿者有着天然的不同。一些机构以学分为承诺,吸引大学生做奥运志愿者,这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东京大学高等教育与发展中心教授 Kobayashi 说。

日本部门如此大费周章地鼓励学生成为体育比赛的志愿者,这还是第一次。即使是在民众生命受到威胁的巨大灾难中,也从未有过类似举动。

人们普遍认为,把学分当诱饵来吸引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是一种错误的方式。但留给东京奥组委的时间已经不多。如果他们无法尽快招募到足够的志愿者,就只能派没感情的机器人上场了。(艾林整理)